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李明山,左玉河主编. —开封:河南
大学出版社,1999.6

(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靳德行主编)

ISBN 7-81041-531-X

I. 当… II. ①李… ②左…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
国-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40357 号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7.125

字数:445 千字 印数:1—3 000 册

定价:36.00 元



丛书前言

“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是一套以当代中国诸领域思想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是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南省“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同时也是河南省“八五”科学重点出版项目,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

这套丛书由《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10种组成。

本丛书在编写原则上,重在反映当代中国诸领域思想的发展演变轨迹,除此之外的其他内容仅做铺垫陈述。在编排体例上,允许各册根据内容的需要,在编、章、目的设置上有一定的灵活性,不做统一安排。丛书的编写时限,原则上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90年代中期为止;其中个别分册,由于自身领域思想发展的固有特点,在时间的起迄上稍有不同。对可以归属于几个分册的交叉部分的内容,其取舍原则是,根据各册的特点,放入最相关的分册中撰写。如“一国两制”问题,既可放在政治思想史中写,又可放在统战思想史中写,但考虑到后者更为适宜,就放在了统战思想史中进行阐述。港澳台地区的内容,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丛书暂付阙如,待以后修订再版时补入。

本丛书由河南大学靳德行教授任主编,首都师范大学秦英君

教授任常务副主编,河南大学程凯教授和当代中国研究所蒋建农副研究员任副主编,河南大学翁有为副教授任秘书长。正当各册开始拟定编写大纲、准备撰写的时候,丛书主编靳德行教授不幸突然病逝,丛书编委会全体成员深感悲痛。靳德行教授去世后,经丛书编委会推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由秦英君教授代行主编职责。

本丛书聘请国内著名思想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为顾问,设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负责丛书编写过程中的有关事宜。丛书实行分册主编制,由各册主编负责具体编写事宜,最后由秦英君教授审阅定稿。

承担丛书撰写工作的作者大部分是中青年学者,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敏锐、敢于创新、勇于进取。丛书10种各具风采、不落俗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毋庸讳言,由于各位著者的学识、功底不同,各册论著的水平也会参差不齐,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热心于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丛书的编写得到了国家教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河南省社科规划办、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有关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为保证丛书撰写工作的顺利进行,特组织了由河南省社科规划办和河南大学有关领导组成的以王才安、王文金教授为主任,毛锡学、刘长典、关爱和教授等为委员的工作指导委员会,他们对丛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全力支持。在撰写过程中,我们曾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的研究专著,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启示。在丛书出版的过程中,河南大学出版社的领导 and 编辑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当代中国思想史丛书”编委会

1996年10月



总 序

中国思想史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们就已开始探究天地、人生、道德问题,撰写出了富有哲理的思想著作。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和发展,这些思想不断被后人创新完善,逐渐形成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思想体系。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源远流长,根据史家所言,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期,尽管这种断然截流的分期方法未必全部合理,却也约定俗成。当代中国思想史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和延续,它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最近阶段。

中国思想史的历史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历经春秋战国诸子之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等阶段的发展演变,始终如一地展示了它的特有风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重道德伦理思想、重政治思想,即从“内圣”入手,开“外王”之业。“内圣外王”的人生模式,成为历代封建知识分子追求学问之极致和道德修养之圭臬。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数千年的古老大门被洋枪洋炮打破,于是中国社会起了根本的变动。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思想发展的近、现代时期。此时期文化思想上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围绕着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领域各个派别间展开了长达一百多年的争论。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到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从西化派的“全盘西化”到东方文化派

的“本位文化”等等，整个思想的发展始终与民族的救亡图存结合在一起。五四运动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代中国思想史也由此开始。如果说，中国近、现代思想是与民族的救亡图存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当代中国思想则是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而展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切和争辩，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繁博多样的当代中国思想史画卷。如何将这幅画卷真实生动地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是史学界当前一个迫切和艰巨的任务。

当代中国思想史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一批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命名的专著、教材以及文献资料陆续问世，一些专门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机构也先后建立起来。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研究内容的重复、体例的类同、资料的贫乏等等，尤其是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更是寥若晨星，几乎成为“国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可以说，一部缺乏思想史内容的当代中国史是肤浅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正如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所说，“不知思想，则无由知事之形质……以此而言史学，则于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皆不能知其成立转变之由，不足称为真正知识矣……欲弥此憾，非先有详博之思想史不可”^①。

回顾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的发展一直受到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干扰，“左”的思想的长期发展和它带来的危害尤为严

① 《吕思勉先生介绍——论蔡撰思想史与史学界之关系》，见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23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重。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的动荡，使诸领域思想的发展陷入空前的危机。人们不禁要问，建国以来，何以“左”的思想会长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有一段对孙中山和康有为思想的评价，对我们很有启示。他说：“孙中山的优点是，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是随着历史潮流的变动而变动的。而康有为说过，他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三十岁以前就完全定了，以后不能改变，也不求改变。所以，他从早年的先进人物变成晚年的顽固派。人们觉得奇怪，康有为为什么变了呢？其实康有为并没有变，而是时代变了。”由此不难理解，建国以来，国际国内的大环境都发生了变化，而思想和认识却仍停留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样的思想怎能不是“左”的呢！

一种思想的完成，无不与当时政治有关，一个大思想家的产生，亦有他的政治背景。在本丛书撰写中，我们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叙述当代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重在把学术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与社会政治相结合，力求揭示当代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固有脉络。我们可能做得不好，但正如《诗经·小雅》中所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万般思念本丛书已故的主编靳德行先生，谨以此作为对他的告慰和纪念。

秦英君

1996年元月于北京



目 录

绪 论	(1)
一 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	(1)
(一)学术与学术思想	(1)
(二)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分期与演进	(5)
二 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10)
(一)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分期	(10)
(二)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范围	(13)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旧学批判 与 新学重建(1949~1956)	(19)
一 建国初期的学术指导方针	(19)
(一)《共同纲领》的文化(包括学术)方针	(19)
(二)知识分子的改造方针与其实施	(20)
(三)学习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方针 的确立	(23)
二 建国初期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	(25)
(一)蔡尚思对儒家思想的总批判	(25)
(二)对电影《武训传》文艺思想的政治批判	(28)
(三)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政治批判	(31)
(四)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36)
(五)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及对他的批判运动	(41)

(六)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对他的批判运动	(48)
(七)对建国初期学术思想政治批判的评析	(52)
三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学术思想重构	(55)
(一)李达、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	(56)
(二)郭沫若、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	(69)
(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旗帜的高扬和茅盾、 周扬、冯雪峰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78)
(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94)
四 建国初期的学术思想争鸣	(99)
(一)关于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的讨论	(100)
(二)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问题的论争	(104)
(三)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106)

第二章 学术思想的活跃与曲折发展

(1956~1966)	(111)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	(111)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111)
(二)陆定一的诠释和毛泽东的解说	(113)
二 学术思想的活跃	(118)
(一)孙冶方、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18)
(二)杨献珍唯物主义思想在逆境中的曲折发展	(129)
(三)翦伯赞、吕振羽的史学思想	(133)
(四)文学理论界学术思想的活跃与反复	(143)
(五)熊十力对新儒学思想的拓展	(152)

三	学术思想的争鸣与讨论	(160)
	(一)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和“一分为二” 与“合二而一”的两场论争	(160)
	(二)关于价值规律作用的讨论	(166)
	(三)文艺理论界的学术思想论争	(175)
	(四)史学界开展的“为曹操翻案”的讨论 和关于历史主义的论争	(182)
	(五)关于美学思想的讨论	(193)
四	“左”倾思潮冲击下对学术思想的政治批判	(196)
	(一)对马寅初学术思想的批判	(196)
	(二)周谷城的学术思想及其被批判	(205)
	(三)冯友兰的学术思想及其被批判	(212)
第三章	学术思想的禁锢(1966~1976)	(222)
一	“文化大革命”对学术思想的“革命”	(222)
	(一)对学者的迫害及对学术思想的禁锢	(222)
	(二)对学术事业的践踏及对学术思想的扭曲	(230)
二	“文化大革命”中学术思想的畸形发展	(234)
	(一)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	(234)
	(二)“四人帮”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论”	(238)
	(三)“四人帮”的文艺创作思想剖析	(243)
	(四)“四人帮”的“一片黑暗”论和“评法批儒”中 的影射史学	(247)
三	逆境中的关怀与学者的学术思想	(250)
	(一)党的健康力量对学术人才和学术事业的保护	(250)

	(二)难以扼杀的理性	(256)
	(三)经济学家无悔的选择	(257)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获罪的哲人	(263)
	(五)史学家的傲骨与沉思	(267)
	(六)梁漱溟的“舍我求真”的思想	(270)
第四章	学术思想的解放(1976~1984)	(283)
一	学术思想的复苏与解放	(283)
(一)	“百家争鸣”学术方针的重新提倡	(283)
(二)	对“左”倾学术思想的清算	(291)
(三)	对建国以来学术思想的理性反思	(297)
(四)	对一些学术问题的争鸣与讨论	(305)
(五)	学术思想的转变	(320)
二	学术思想的重新活跃	(323)
(一)	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	(323)
(二)	经济史学界对经济史领域的开拓	(330)
(三)	哲学史学界对中国哲学史的新探讨	(334)
(四)	金景芳对中国奴隶社会史的微观研究	(341)
(五)	王元化对若干文艺理论问题的思考	(345)
第五章	学术思潮的嬗变与学术思想的 空前活跃(上)(1984~1992)	(347)
一	学术思潮的嬗变	(347)
(一)	海外学术思潮的涌入	(347)
(二)	中国学术思潮的嬗变	(357)
二	哲学思想在挑战中发展	(361)
(一)	哲学思想的争鸣	(362)

(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体系的新思索	(368)
(三)张岱年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拓展	(375)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建构	(381)
三 史学思想的空前活跃	(386)
(一)关于史学理论体系问题的讨论	(386)
(二)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	(388)
(三)关于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问题的争论	(391)
(四)关于史学功能、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争论	(394)
(五)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	(397)
(六)白寿彝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构	(401)
四 经济改革思想的迅速发展	(407)
(一)关于经济改革关键点问题的讨论	(408)
(二)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问题的探索	(412)
(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	(416)
第六章 学术思潮的嬗变与学术思想的 空前活跃(下)(1984~1992)	(437)
一 文艺学思想的争鸣与发展	(437)
(一)文艺学方法和观念的讨论与更新	(437)
(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争鸣与建构	(441)
(三)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	(449)
(四)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争论	(454)
(五)钱钟书的文艺思想	(460)
二 法学、政治学的重建与发展	(470)
(一)法学的重建与发展	(470)
(二)政治学的重建与发展	(480)

三	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的重建与发展	(489)
	(一) 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	(489)
	(二) 教育学等学科的恢复与发展	(496)
四	考古学的兴盛与发展	(501)
	(一) 新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	(501)
	(二) “地层学”在考古学中的运用	(505)
	(三)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思想	(507)
	(四)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论争	(511)
	(五) 其他考古学新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514)
结束语：坚持“双百”方针 促进学术思想繁荣		
	(517)
主要参考书目		(525)
后 记		(530)



绪 论

一 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 学术与学术思想

学与术本来是分家的。学是指学问、学理或学科,术则是指技艺、技术或方法。学术合起来是指较为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学问是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系统知识。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办学,学术上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认为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理之所。他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与学术研究会欢迎会的演说中又进一步论述了学与术之间的关系:学是学理,术是应用;学与术之间是有区别的,必须并进才好;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和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①作为学科领域中的每门专业学问,大致上要实施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历史发展研究,二是基础理论研究,三是应用实践研究。学术研究要基础、应用研究并重,不可偏废;要有学有术,二者密切结合。有学无术是脱离实际,有术无学是无源之水,缺乏生命力。

中国的学术研究在近代以来有较大的发展。曹聚仁早年曾笔

^① 《蔡元培教育文选》,13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录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完成了《国学概论》。他后来谈及“国学”时说,“国学”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曾有“支那学”、“汉学”之称。19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国的学人,所译的“国学”就是“中国学术”的意思。日本人翻译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便称《支那学概论》。还有人称“国学”为“国粹”,章太炎称之为“国故”,他的《国故论衡》就是专论中国学术的,因此又曾有“国故学”之说。曹聚仁曾把《国故论衡》和《文心雕龙》、《史通》等学术经典等量齐观,并认为时人即便是写了100万字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也未必有它那么丰富的内容,还打算将《国故论衡》的“诸子学”篇作为他讲授“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教材。在曹氏看来,“本来谈‘国学’或‘国故’的,总以为是中国独有的学术思想;其实‘国学’者,只是‘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并非只此一家的学术”^①。后来他又说,把“国学”说成是中国的学术思想,自当包括“文史”在内。他还说:“国学”或“国故”一词内涵本来含混,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也可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从先秦诸子一脉说开去,又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

蔡尚思先生在1932年于上海启智书局曾出版中国学术研究专著《中国学术大纲》,其中解释“国学”时称: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是中国学术。既然叫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是无所不包了,也就无所偏倚了。因此他认为,曹聚仁把国学单指为中华民族之结晶的说法,吴文祺把国学视为中国语言文字学的说法,抑或章学诚、章太炎将国学视作以史学眼光观察一切的观点,以及那些将国学误认为是单指国文与中国文学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

近年来张岱年先生在国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在《国学丛书·序》中称,“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称“中国学术”为“国学”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中国传统学术内容丰富,包罗宏广。

^①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

明清之际方以智论学术,将学术分为三种:一为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为通几之学,即哲学;三为宰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清以来诸多学者论学术,又将学术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持此说的主要是戴震、曾国藩)。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哲学、史学、文学。后来有注重国计民生的学者倡导经世之学,即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而后学术又不断发展,国学的内容分科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总之,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及宗教、艺术等。^①张岱年关于“学术”的上述解释和曹聚仁、蔡尚思大同小异,但也有独到之处。

关于“学术”的阐释,梁漱溟在《东方学术概观》中的观点也值得重视:“学术出自人类的智慧而育成于社会交流之上。所谓人类智慧非他,人心内蕴之自觉是也。凡用心在某一问题者运用感官探索之时,必留有印象于衷怀之自觉中,先后多次较量,乃悟得其相关规律,从而步步深入焉。然一人经验有限,更赖彼此交流,先后传递修正,由小道而蔚成大观。”^②此外,梁氏还就学术与人类生命和生活的关系进行过论述。他认为:学术是社会的产物,因为人类的意识原本就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所以一切学术都产生于内蕴自觉的意识作用;学术是人类生活中所倚以解决问题的,解决了困难障碍,即取得了自由;学术进步,不外是奋进不已的生命本性通过人类社会交往而发挥表现出的前进;学术莫不应于问题需切而来,有什么问题,产生什么学术;人生具有性质不同的三大问题,即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等。梁漱溟尝谓,他从少年时便对人生问题烦闷不解,使他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百家,一旦于人生道理若有所会,则亦不复多求;同样,因中

^① 张岱年:《国学丛书·序》,1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② 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绪论》,1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

国问题几十年来急切不得解决,又使他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从梁漱溟对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阐述,可以概见他对学术思想的整体理解。学术思想在他这里,是和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

对学术思想的理解持与上述相近观点的还有曹聚仁。他曾不止一次地说:“一种学术思想,便是那一时代的人,在那一社会环境中,对社会人生问题的一种新的解说。”^①在他看来,中国学术思想,便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对发展变化着的社会人生问题的新的解说。曹聚仁对学术思想的认识,既强调了与社会人生问题的密切关系,又强调了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作用。

强调学术思想离不开环境影响的还有王伯祥、周振甫。1935年,他们在亚细书局出版了《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一书,其中谈道:“学术思想是人类生活奋斗中所孕育的粲(灿)烂之花。因为人类满足他生存的欲望,便须和四围的环境奋斗,奋斗的结果便创造出人类的文化来。各式各样生活的方式就是文化的结晶,学术思想就是文化的精神。所以学术思想离不了环境的影响,同时又总是归结到人类生活的改进。”他们将学术思想归结为文化的精神。

其实,梁启超也曾把学术思想视为精神。1925年8月,他在群众图书公司出版有《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一书,其中说道:“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觐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极为密切。”梁启超于此主要强调了学术思想的重要性。

不过,将学术思想置于重要位置来认识的何止梁氏一人。钱

^①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212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

穆是中国现代研治学术思想史的大家。他的著作,尤其是史学著作处处渗透着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他把社会划为三个层次:“最下层之基础”为经济;“最上层之结顶”为政治制度;“中层之干柱”则为学术思想。因此,他主张以文化学术为中心来考察和分析历史问题。^①此外,海外学者南怀瑾在《楞严大义今释后记》中的一段话,也说明了他对学术思想的重视:“从前受蜀中一前辈学者嘱咐云:‘人心世道,都由学术思想而转移。文字是表达学术思想的利器,可以利人,亦可以害人。聪明的思想,配合动人的文辞,足可鼓舞视听,成名一时。但现在世界上邪说横行,思想紊乱,推原祸始,都是学术思想制造出来的。’”因此,他的著作正是为以学术思想转移人心世道而撰述。

至此,可以说,既往学术大家在认识学术思想方面,见仁见智,各有独到之处。这里不可能也无意于对学术思想作什么确切界定,因为这个任务是只有作了更多深刻研究的博大精深者才能承担的,于此只为一般探索之便,将学术思想的涵义作以下概述:学术思想是在特定社会环境实施较为专门、系统的学问研究过程中,运用创造性思维方式获得的理性认识。本书所谓“学术思想”,即取此涵义。

(二) 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分期与演进

中华民族的古老和睿智,从她悠远的学术思想渊源即可概见。梁启超研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曾将其渊源上溯到黄帝子孙那里。而后,他又把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史划分为八个时代: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春秋末及战国为“全盛时代”,两汉为“儒学统一时代”,魏晋为“老学时代”,南北朝、唐是“佛老时代”,宋、元、明是“儒佛混合时代”,清以后 250 年是“衰落时代”,民国年间是“复兴时

^① 张媛主编:《史学概论》,149~150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